

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再考辨

——与闫化川先生商榷

周 郢

闫化川《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》一文依据“大宋辛酉”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，认为“碧霞元君”封号于宋天禧五年（1021）前业已出现；又据明正德二年（1507）《御告文碑》，认为自本年起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。本文认为闫文这两个结论均不能成立，指出：①所谓“大宋辛酉”的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纯为伪刻，不可凭据，“碧霞元君”封号绝非始于北宋；②朱明皇室与碧霞元君发生联系，远早于正德一朝，所谓“正德二年”是碧霞元君信仰转换的“标志性时间”之说亦难成立。

关键词：碧霞元君 封号 碧霞元君信仰 泰山

作者周郢，1970年生，泰山学院副研究员。

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07年第1期所刊闫化川先生大作《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》，依据泰山新发现的“大宋辛酉”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与明正德二年（1507）《（致祭碧霞元君）御告文碑》，认定“碧霞元君”的封号至迟在北宋天禧五年（1021）业已出现，并认为“明代正德二年之后，碧霞元君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封号”——“正德二年”可谓“是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的标志性时间”。

笔者认为，闫文在碑志引据上存在较多疏失，致使其二项最终结论似均难以成立。今分别与之商榷于下：

一、所谓“大宋辛酉”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是伪刻不可引据

闫文第二节《碧霞元君信仰的溯源》论述宋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全部史据，均来自“大宋辛酉”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。此碑最早由田承军先生发现并公布^①，闫文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，先将“大宋辛酉”断为北宋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继之又进一步阐述其意义：“现存的民间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最早文字记载，大概是宋真宗天禧五年（1021）所立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。……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的立碑时间的‘大宋

^① 田承军：《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》，载《史学月刊》2004年第4期。

辛酉岁’有三，一是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（961），二是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（1021），三是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（1081）。宋真宗改元‘大中祥符元年’之后前往泰山封禅，大中祥符一共九年，天禧年号一共五年，这期间的14年就为碧霞元君信仰在民间的继续流传、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，具备了更宽泛的发展空间，碧霞元君信仰从最初的局限于山东一地而扩展到广大的中西北地区。”

在此首先要揭出的是，原题“大宋辛酉”、闫文断为宋天禧五年的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，其实是后人伪托之刻。这方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原立于泰安城西天书观，今移存岱庙^①。残石高约116厘米，宽约57厘米。正文楷书共20行，每行约28字。碑额篆书两行，文为“东岳元君香火社碑”。前7行为碑题及参预香火社之官吏题名，后13行为香火社记及年款。虽文字漫漶已甚，但尚可辨认多处。之所以将此碑定为伪刻，是从碑文中发现了一系列的明显破绽。如建置方面，碑文中凡五次出现“山西等处”，考“山西”之名虽于战国秦汉时已见诸史籍，但作为政区之名的“山西等处”，却是始于明代。《大明一统志》卷十九《山西布政司》载：“山西：古冀州地。……宋置河东路经略安抚使。……本朝（明）置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，领太原、平阳、大同、潞安四府，泽、汾、沁、辽四州。”此碑中有“山西等处承宣布□□□（政使司）”字样，可推知其时代应在明洪武以后。而北宋一朝，于山西境内仅设“河东路”，并无“山西等处”的政区。只此一事，便足证此碑的时代只能属“大明”而不是“大宋”。

再如官制方面，碑文出现的职官有“通议大夫山西等处承宣布□□（政使）”、“□□大夫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”、“中议大夫山西等处监（下缺）”、“府管河通判”。今按：承宣布政、提刑按察二司使为明代所置各省行政、司法之最高长官。《续文献通考》卷六十《职官考十》：“明承宣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。……洪武九年改……山西诸中书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。”又：“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一人。……明初置。”“管河通判”亦为明代官制，《续文献通考》卷六一《职官考十一》又载：“府知府一人，同知、通判无定员。……同知、通判分掌清军、巡捕、管粮、治农、水利、屯田、牧马等事，无常职。”又“通议大夫”、“中议大夫”均为明文官之散阶，《明会典》卷八《吏部七·验封清吏司》云：正三品“升授通议大夫”，正四品“加授中议大夫”。上述职名之中，布政、按察二司使又为明朝方有之官制，足证此方碑记的时代不会早于明。

通过以上考辨，可见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中之地名、职官均属明制。宋人自无可能预知后世制度，因此这方题署为“大宋辛酉岁”（按此纪年形式亦与习见宋碑不合）的碑石，绝非宋代所镌，而是明人所伪托。对此宝卷专家车锡伦教授曾作推考，认为伪碑之出与明代民间宗教兴起有关，其在致笔者函中称：“我臆测此碑先是出现在嘉靖前后，后来那位‘东阿社学王□’重刻时改‘大明’为‘大宋’，并删去年号，时间在万历年间或稍后。王某作伪的背景，与民间教派有关。此时，民间教派活动极其普遍，这

^①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，拓本刊于袁明英主编《泰山石刻》第二册，548页，中华书局2007年1月版。关于此碑的著录与考释，详见拙作《“碧霞元君”神号源起时代新考》，载《民俗研究》2007年第3期。

些教派都把泰山老母纳入‘无生老母’信仰的女神系统。同时，朝中的大臣们也上书吁请查禁各种民间教派。教派人士因为得到后妃太监和官僚贵族的支持，活动照旧。他们此时刻印的经卷（宝卷），便在时间上作伪：一是提前，如一部《佛说皇极结果宝卷》，卷末题识为‘宣德五年孟春吉日刻行’（另本残页题为‘永乐十’）；一是胡乱题识，似是而非。如一本《忠孝二郎宝卷》题为‘嘉靖××（干支）××年’，但干支同纪年对不上号。总之，作伪手法种种，总有漏洞。”我以为车说甚合事理。明代信众为了将碧霞元君伪托为宋号，除了杜撰宝卷经书，也很有可能攻窜旧碑以实己说。此碑既伪，那么“碧霞元君”名号起于宋代说也就失去了惟一的文献依据。即便我们持最审慎的态度，先不对此碑下“伪刻”的最终结论，那在上述疑点排除之前，此碑也不宜用作研究宋代碧霞元君信仰的证据文献。

关于“碧霞元君”封号并不起于宋代（闫文论称“宋真宗未封碧霞元君”，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认同），还可以举出诸多旁证资料：

1、宋王钦若《社首坛颂》：“惠洽于人，虽小不舍，新玉女之像是也。”^①按：钦若此碑缕述泰山列仙，悉称“保生”、“广生”封号，如玉女已有碧霞元君之号，钦若不可能讳而弗书。

2、宋王山《盈盈传》文中悉称泰山女神为“玉女”^②，无一处用元君之称。王山为北宋嘉祐时人。

3、宋刘衮、金濮国公主谒祠刻石，或称为“玉女祠”，或称为“玉仙祠”，也无“碧霞”或“元君”字样。

4、元代道籍《东岳大生宝忏》在列举东岳诸神列仙时，凡有封号者如“淑明后”、“炳灵王”、“灵派侯”等，悉称封号；而于玉女则止称“玉仙娘娘”^③，足证元代尚无元君封号。

5、元秦子晋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》也称玉女为“岱岳太平顶玉仙娘娘”，可与上条互证。

在众多宋元时代的反证之前，《东岳元君香火社碑》的独家记载也只能是“孤证不立”。

闫文中还用了大量笔墨考证碑文中的“东阿社”，认为其不是山东东阿县的香社，而是远在陇西之“东阿社”地名，以此来证明宋代西北已有碧霞元君的信仰。按碑中出现“东阿社”的原文是“东阿社学王□”，应是立碑人的题名。“社学”为明清设于乡间的学校，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五十《学校考·郡国乡党之学》载：“（洪武）八年正月，诏天下立社学。”又《明会要》卷二十五《学校上·社学》：“方克勤知济宁府，立社学数百区。”“（洪武）十六年，诏民间立社学，有司不得干预。”“东阿社学”即立碑人所在之东阿县乡村学校，而非陇西地名，实与所论宋代西北碧霞元君信仰全无关涉。

^① 宋王钦若：《社首坛颂》，载明汪子卿撰、周郢校证《泰山志校证》卷二，黄山书社2006年版。

^② 宋王山：《盈盈传》，载宋李献民《云斋广录》卷九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
^③ 《东岳大生宝忏》，载《道藏》第十册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。

二、“正德二年”不是碧霞元君信仰 出现转变的“标志性时间”

闫文第三节《碧霞元君信仰的被正式认可》依据明正德二年《御制告文》一碑，认定“明代正德二年（1507），是碧霞元君的‘私祀’性质发生转变的关键一年。这一年的闰正月，武宗朱厚照派遣太监苗逵致祭之后，碧霞元君信仰才开始由纯粹的民间信仰转向为官方认可的民间信仰，并逐渐成为了专供帝王皇室贵族所信仰的神祇”。并进而指出：“这一标志性的时间，应当是碧霞元君信仰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一个分界线。”

按正德二年《御制告文》碑 2002 年出土于岱麓灵应宫，是确凿无疑的明代元君信仰文献。而正德一朝，也确为明代皇室与泰山元君信仰关系日趋密切的时期，据明人马一龙《东封纪略》载：“我朝历圣只有祭东岳泰山，并无及此（指碧霞元君）者。惟章圣太后正德间方遣一武臣进香，而天下自是盛行。”^①但武宗遣祭是否如闫文所说“是历代帝王中对碧霞元君进行祭祀的第一次”，正德二年是否为元君信仰由“民”转“官”的标志时间，仍大有讨论之余地。

闫文所引正德《御制告文》碑虽系现存最早的致祭元君碑刻，但却远不是现存最早的遣祭文献。在此之前，已有弘治《御制告文》存在：

御祝文：维弘治十六年岁次癸亥正月朔初一日己巳，皇帝遣御马监太监苗逵，致祭于碧霞元君曰：懿德含弘，仁慈广霈，佑苍生于寿域，鼓群品以沾依。兹因眇躬，偶爽调摄，敬祈圣力，永佑康宁。特以香帛，用伸告祭，益彰灵应，福佑家邦。谨告。^②

这则史料足以说明，早于正德的弘治一朝，便已有皇帝遣祭碧霞元君的先例，告文俱在，确切无疑。这种致祭，还可远溯至成化朝，据明成化朝尹龙《重修泰山顶庙记》载：“昭真祠在泰山绝顶，世传谓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。圣天子御极十有五年（成化十五年，1479），命太监陈喜来修祀事。明年，诏修是祠，即故址增饰之。”^③而尹碑后文又称：“维我列圣，每遇登极，必遣廷臣以祀方岳，又时命中贵有事于祠。或金帛朋贝以将其诚，或冠帔旌幢以拂其像，盖神之灵赐感人，实有以致之。”又嘉靖朝崔文奎《重修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祠记》碑云：“历代尊奉已久，逮我朝崇重之典尤盛。有宝香异品之颁，有华冠锦袍之锡，岁时遣官致祭。”^④似明帝遣祭元君之礼由来甚久，于成化朝之前已有举行。此虽尚无法座实，但只据尹龙之碑也可确认迟于明宪宗朝始，已有遣使致祭碧霞元君之定制，远非迟至正德二年方才举行。

以上还仅是就遣使致祭而论，其实朱明皇室与碧霞元君的渊源，还可做更前的追溯。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一三三载：

^① 明马一龙：《玉华子游艺集》卷十九，载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108册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。

^② 均见明汪子卿撰、周郢校证：《泰山志校证》卷二，黄山书社2006年版。

^③ 同上。

^④ 同上。

（正统十年九月乙亥）山东济南府泰安州道正司奏：“东岳泰山上有昭真等宫观，俱系历代古迹，神祠年久损坏，乞赐修葺。”从之。^①

按昭真祠即后之碧霞宫，见前引尹龙碑记。正统一朝，明英宗已有敕修昭真祠之举，说明此时的明室便已接受碧霞元君的信仰，因为“敕工”非同寻常，皇帝不可能为他心目中的“私祀”或“淫祀”而大兴土木。而成化十九年“敕修”昭真观告成后，明宪宗“赐额碧霞灵应宫”，更清楚显示了明廷对碧霞元君这一神号的认同。这种以皇帝名义对碧霞宫的整修延续不绝，如弘治朝徐溥《重修碧霞灵应宫记》载：“弘治八年（1495）春正月，巡抚山东都御史熊公翀言：泰山绝顶碧霞灵应宫毁于火，宜治。事下户部议，谓泰岳有生物功，凡祠关祀典者不宜不飭。且神以灵故，四方奔走士女操金帛为祷祈者，岁所积甚夥。宜令按察宪臣籍之，以为工费。诏可。”^②尔后嘉靖、万历、天启、崇祯各朝，碧霞祠俱有“敕修”之工。

遣祭元君最早见于成化朝，敕修庙宫最早见于正统朝，此为元君信仰与朱明皇室的关系。而其与明地方官府发生联系，更远早于这一时期。

目前所知最早的一篇关于碧霞元君的明代碑记，为天顺朝许彬所撰《重修玉女祠记》，此碑系记天顺五年（1461）济南知府陈铨重修玉女祠事，碑云：“予自永乐九年发解山东，还登此山，距今五十有一年。为天顺辛巳，又得陪山东监察御史康骥德良、按察使王钺世昌同一登览，瞻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，衣冠像设，俨然生气降临凡间，心甚敬畏之。已而仰瞻新构，凌绝顶，出霄汉，栋宇翬飞，丹青炳焕。榱桷栉比，万瓦鳞次，瓦皆冶铁为之，经久之计也。询之，乃济南知府陈铨区画措置，而泰安知州同心协谋而成者也。正殿歇山转角，为间者五，为楹者七，中为神座，以妥泰山天仙玉女。东西为廊各三间，东居配享元君，西居监池圣母。其下又各五间，安奉阴府官署及士民官祀之神。外为门三间，缭以周垣，命道流焚修香火，晨昏启闭，严恭肃敬不敢褻也。既还，推官齐鲁以王、康二公之命，具始末，征予文记之……。”^③所记庙宇修葺神祇享祀，均由官府经办。其祠虽“令道流焚修”，实由官府主管。这种体制始于何时，许彬未作记述，但尚有痕迹可寻。弘治《泰安州志》卷一载：“玉女祠：……元因旧址建昭真观，洪武初重修。”洪武初庙工即被郑重记入官修《州志》，很可能系由官府主持。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推测，碧霞元君祠的官方化大体应开始于明初，而“碧霞元君”的神号也大致出现在同一时期。

即使如此，也很难将“明初”视为碧霞元君信仰“由纯民间信仰转向官方认可的民间信仰”的“关键”时间。因为碧霞元君信仰兴起是由于宋真宗“新玉女之像”的造神运动而引发（虽然真宗并未加封号），真宗并“御制”记文为这一女神张目，此事屡见史籍，应是史实而非虚构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十云：“（大中祥符元年九月）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顶，泉源素壅而浊。初营顿置，山下醴泉发，池水亦涨，及工役升山，其

^① 《明实录》第16册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，1967年版。

^② 见明汪子卿撰、周郢校证：《泰山志校证》卷二，黄山书社2006年版。

^③ 弘治：《泰安州志》卷六。

流自广，清泚可鉴，味甚甘美，众赖以济。王钦若请浚治之，池侧有石像，颇摧折，诏刘承珪易以玉石。既成，上与辅臣临观。辛酉，遣使砮石为龕，奉置旧所，令钦若致祭。”又《玉海》卷一七一《宫室·池沼》“祥符泰山玉女池记”云：“祥符元年议东封，先营顿置。泰山顶有玉女池，素壅而浊，至是泉忽湍，清泚甘美，工徒赖以汲用。经度制度（置）使王钦若请浚治之，池侧有石像颇摧折。九月，诏皇城使刘承珪易以玉石。辛酉，像成，召宰臣观于崇政殿西序，遣使砮石为龕，奉置旧所，钦若致祭。十月己丑，上作记示辅臣。庚戌，上步自御幄观玉女泉，命王旦等观圣制石记。”又同书卷三一《圣文》“祥符泰山铭赞”等条云：“祥符二年（1009）五月戊午，对辅臣于后苑，出御制御书《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》，司命天尊、仁圣天齐王、周文宣王、玄圣文宣王《赞》，《玉女像记》示之。”因玉女信仰先由皇帝所提倡，虽然其从未获列官府祀典，但从一开始便明显带上官方色彩，如岱顶天柱峰有宋元祐六年（1091）兖州知州谒玉女祠刻石：“兖海守刘袞奉诏祈雪，次谒玉女祠，率巡山刘孟、邑令林会登二绝顶，临四观，遍览胜概。元祐丁卯孟春三日。”这是官员最早拜谒玉女之记录。随着宋金易代，玉女信仰又影响至女真皇室。岱顶大观峰有明昌元年（1190）濮国公主谒祠题记云：“皇姑濮国大长公主□□□□同驸马濬州防御蒲察敬诣岱岳，焚香致礼毕，明日遂登顶，拜于玉仙祠下。时明昌元年三月十二日。”元初昭真祠的拓修，也明显得到东平行台的鼎力支持。元杜仁杰《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》云：“武惠公（蒙古东平行台严实）以书来召（道士张志纯）”，委其重葺泰山名庙宇，“……自绝顶大新玉女祠，倍于故殿三之二；取东海白玉石，为像如人然，一称殿之广袤”^①。这一信仰历经百年的传播，由官方而民间，至明初开始形成远及全国的崇信高潮。同时由于明廷施行祀典复古政策，诏去泰山神帝号，同时强化泰山神之官方色彩，严禁民间“非礼之渎”，使泰山神信仰由民间祀典向官方祀典回归。民间对于泰山的崇祀活动，只得另寻其对象，亦即清人孔贞瑄《泰山纪胜》中所论：“抑或东岳非小民之所得祀，故假借祀碧霞云尔。”另一方面，泰山女神也在道士的操纵下，开始了从“玉女”到“元君”的转换，首先是神号之加：玉女神兴起虽与朝廷有关，但因身无封号未列入朝廷祀典，因此被一些正统派官员视为淫祀，如正德朝工科都给事中石天柱等言：“祀典惟有东岳泰山之神，无所谓碧霞元君者，淫祀非礼，不可许。”^②道徒打出宋真宗敕封的旗号，有助于使这一奉祀合法化。而碧霞元君较之玉女之名，更具有道教色彩，进一步明确了其神的宗教归属性。再者是将女神形象从“年可二十四五”（《盈盈传》中所记玉女年龄）的青春女性向中老年女性转换，并赋予其主司生育的功能，以适应社会群体“母神”崇拜的信仰诉求。重塑后的碧霞元君形象，得到朝廷与民间的双重认可：在朝廷方面，自正统十年（1445）始，内廷不断下诏发帑重修岱顶昭真观；至明宪宗嗣位，“遣廷臣以祀方岳，又时命中贵有事于（昭真）祠”^③，开启了致祭元君的先例；成化十九年（1483）重修

^① 载孔繁信：《重辑杜善夫集》，济南出版社1994年版。

^② 《明史》卷一八九《石天柱传》。

^③ 明尹龙：《重修泰山顶庙记》，载弘治《泰安州志》卷六。万历《岱史》卷九。

昭真祠后，宪宗赐额为“碧霞灵应宫”，无疑首肯了道徒对女神的形象改造与碧霞封号的真实性。在民间方面，老母形象的碧霞元君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明万历朝大学士王锡爵记称：“予往行齐鲁道中，顶斋戒弥陀者声闻数千里，策敝足茧而犹不休。问之，曰：‘有事于碧霞。’问故，曰：‘元君能为众生造福，如其愿。贫者愿富，疾者愿安，耕者愿岁，贾者愿息，祈生者愿年，未子者愿嗣。子为亲愿，弟为兄愿，亲戚交厚靡不交相愿，而神亦靡诚弗应。’”^①与此同时，元君庙祀亦由泰山渐向周边传播，由京师，而北直，而江南，渐成为普及全国的民俗信仰。尔后且胫大于股，其神威赫然凌驾于岳帝之上，正如清人王照《行脚山东记》所论：“土人终日仰对泰山，而不知有泰山，名之曰奶奶山。”^②因此，明代前期可以称作是碧霞元君形象的转型期，却很难说是“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之标志性时间”。

另外，闫文在论述正德《御制告文》碑时，还存在一处误读。闫称：“朱厚照在即位的第二年，即派遣苗逵前往泰山‘致祭于碧霞元君’，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苗逵的信任，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祭拜碧霞元君的郑重。立碑者排首是钦差大臣朱钦，字懋恭，邵武人，成化八年进士，弘治中迁山东副使，武宗即位后升任他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山东。之所以委任朱钦担任钦差大臣，而没有让其心腹太监苗逵担任，大概是考虑到祭拜碧霞元君礼节的正式性。因为若委派一个‘刑余之人’担任钦差，就显得对祭拜碧霞元君不够尊重。因此苗逵可以监督军务，却不可以担任钦差行使祭拜碧霞元君的神圣典礼，甚至不能作为立碑者之一，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朱厚照对祭拜碧霞元君的高度重视。”按明代皇帝的泰山祀典，大体是施行一种“双轨制”，即国家事务一般派遣大臣致祭，而皇室事务则多遣内监致祭（有个别例外：如弘治时尝遣内官监太监李兴、御马监太监李瑾、内官监太监齐玄致祭泰山；嘉靖时太后遣其弟玉田伯蒋荣致祭元君），如尹龙碑文中明确记称“时命中贵有事于（碧霞）祠”。今岱顶天柱峰上有宦官题名甚多，即为万历时主持碧霞宫工程与祀事者。因此根本不存在“刑余之人”不能“担任钦差行使祭祀元君的神圣典礼”之说。正德《御制告文》中的“钦差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都御史臣朱钦”，是立碑者而非致祭人，其所受“钦”命之“差”是“巡抚山东”而非“致祭元君”。闫文将职事理解既误，遂将祭者“反客（朱）为主（苗）”，并生发出太监不能祭元君的错误推论。

以上为笔者对闫文结论之不同观点，今冒昧提出，敬请闫化川先生与读者不吝赐教。

（责任编辑 于光）

^① 明王锡爵：《东岳碧霞宫碑》，载《重修泰安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志·金石》。

^② 清王照：《行脚山东记》，载《小航文存》卷一。